



写作的本质是真诚生活

——散文集《生命的礼物——长生心语》的题外话

董晓奎/文

业余时间在生活中占比多少?若细算起来也是惊人的。业余时间所做的“营生”,能结出硕果吗?与本职工作发生冲突吗?这些萦绕心头的疑问,我在长生的新作《生命的礼物——长生心语》中找到了答案。

长生多年来研究心理学、哲学及传统文化,他善于思考,社会阅历丰富,敏锐地洞察当代人的精神需求,将思考与感悟以“短评”“随感”“杂记”的形式记录下来。这种写法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鲜见,中国作家老舍、英国作家威廉·赫兹里特、德国作家瓦尔特·本雅明等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“闲言碎语”。

这部作品聚焦生命意义的思考与探索,长生以乐观豁达、真诚友善的心态观察生活、分析问题,启发读者在事业发展、家庭经营与子女教育、自我成长等方面找到路径与方法。“真正的利他,并不是牺牲自己或者忽视自己,而是相信在与生命的联结中,付出与收获终将形成循环,从而建立我们自身的价值体系。”长生这一观点,我非常赞同。当代年轻人擅长通过网络处理生活中的大小事务,却弱化了主动构建社会支持系统的能力。其实,面对人生不确定性的最好办法,也许不是变得强大,而是与他人建立多维度的、深层次的生命联结,这种联结如长生所言,“不仅是生命能量流动的管道,也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依托。”如此,当人生陷入低谷时,才不至于一蹶不振,也有余力去重建生活。

与长生是“文学发小”,年轻时我们都在莲城普兰店工作。莲城文学青年多,大家身在不同领域,白天上班,晚上写作。长生擅长诗歌,也写散文。当时,我在报社编辑副刊,也算是长生的责任编辑。副刊版面向来少不了诗歌,那些偏居一隅的分行文字,总是格外吸引读者的目光。如今回忆一代年轻人对诗歌的热爱和虔诚,我仍是感慨万千。青春与诗歌的相逢,如蜜里调油、鲜花着锦一般浓郁而绚烂。

早些年,普兰店是一个县级市,报社与电视台、书店与图书馆,一样也不少。这座城市的景致与氛围,若要用一首诗来描绘,莫过于木心的《从前慢》最为贴切。特别怀念写诗的日子,那时候大家都不好意思说“写作”,即使我在报社做编辑,也觉得“写作”一词太庄重,哪是我们这些在社会上跌跌撞撞的“小嫩茬子”所能担当的。那些大作家,像坐拥万顷良田、胸藏韬略的庄园主,而我们不过是在自家门口开辟了一亩小菜园,殷勤地耕耘浇灌,纵然收获微薄,内心也乐观满足。那个年代,街头的绿邮筒非常醒目,我们常在邮筒旁相遇,手里攥着几个沉甸甸的信封,这是要寄往远方报刊的稿件。每个人心中都藏着小小的骄傲:除了赖以生存的本职工作,我们还掌握着写作技能。那时候做梦也想不到,有朝一日,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或出版作品,实现当作家的梦想。

似水流年,我们久未联络,不知是否已在人海中走散。微信诞生了,通讯录里的联络人一键转为微信好友。科技重塑生活方式,我们重新看见彼此,也窥见对方的精神世界。

长生开设了个人公众号,更新频率不算高,却保持着稳定的传播节奏。长生从事监狱管理工作,职责可谓重大,但他不曾放弃写作,这让我心生敬意,也颇感欣慰。后来,每天早晨在他朋友圈品读“早安帖”,那些简洁流畅的文字,如春风拂面,又像耳畔叮咛,让

奔波的脚步缓下来,思忖、反省、顿悟,悄然校准人生的航向。

长生的写作,赶上了两个“好时候”:文学启蒙与文学起步始于20世纪80年代校园文学火热时期,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爱上文学,这一生的精神寄托就有了着落;进入新世纪,“新大众文艺”蓬勃兴起,长生将多年来的写作成果整理出版,这部作品既是献给读者的,也是献给他自己的“生命的礼物”。

20世纪80年代,长生在新金县(今普兰店区)第二中学读书,当时的新金二中,每年都有考上北大、清华的学生,是辽南地区赫赫有名的重点高中。长生是保送生,承载着全村的希望。在长生眼里,城乡中学的差异除了升学质量,最鲜明的就是城市学校拥有文学社。新金二中很早就成立了“新蕾文学社”,长生曾担任文学社社长,他对这段经历始终难以忘怀,对恩师曾祥明、郑红更是无尽感激。两位恩师既是热爱三尺讲台的灵魂工程师,也是钟情于缪斯女神的写作者。曾祥明擅长写杂文,以如椽之笔,畅谈人生百态,剖析社会现象,笔触犀利,擅长以建设性思考探索出路,是深受读者喜爱的杂文家。郑红能够驾驭多种体裁,笔酣墨饱,斐然成章,是辽南地区不多见的才女。这对伉俪是深受学生爱戴的教育工作者,那些语文学得好、具有文学灵气的学生,经过他们的点化和培养,都走上了写作道路。长生也是他们的亲炙弟子,恩师的教诲,如故乡的风景,始终在心里珍藏着。

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文学是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诞生而出现的一道风景,也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思想解放、经济活跃的改革开放背景下,80年代的校园文学空前繁荣,几乎每一座城市中学都有文学社,并且主办一份文学小报。小报采用刻板油印工艺,魏碑或仿宋的秀雅字迹,配上朴拙简洁的题花,散发着油墨特有的迷人气息。当年在校园里,若能得到一份文学小报,不夸张地说,简直是如获至宝,白天黑夜反复品读,内心世界仿佛被小雨浸润的土壤,总会生发出一些思想与情愫。这样的读物,在今天看来是那么简陋寒酸,但在当时的学生们心中,却是极其神圣的。如果能在上面发表一篇作品,那可是莫大的荣耀。前些年,我在《海燕》文学月刊社做编辑时发现,国内一些知名作家无论发表过多少作品、获得过多少重要文学奖项,在个人简介中仍会提及80年代的校园写作经历:或是担任校园文学刊物主编,或是在校园文学小报发表的作品荣获大奖。这些经历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,甚至成为特定文学思潮的源头。没有哪个功名成就、著作等身的大作家,会对校园写作这段经历弃之如敝屣,反而都会像长生一样津津乐道,视为求学时期的重要经历,为青少年时期的心灵成长奠定基石。

如此细致地梳理校园文学的发展历程,无非是想说明一个事实:一个人在少年阶段积累了练笔、发表或获奖的经历,文学的基因就深埋于生命之中。

大学毕业后,长生踏入警界,业余时间钻研诗歌写作。大量的练笔之后,长生开始在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发表作品。长生说,一首诗若为读者带来美的熏陶和思想的启迪,对作者来说是莫大的快乐和褒奖。即使过去了若干年,我还记得长生当年创作的诗歌以乡愁题材居多,不曾走远,这乡愁从何而来?是诗人骨子里的良善,让他对迎面而来的“仆仆奔走的行人”、擦肩而过的“血汗涔涔的劳动者”多

了凝视与回眸。这悲悯与伤感交织的心情,只有倾注于笔端才能得以纾解。

长生创作《生命的礼物——长生心语》这部作品,背后蕴含着双重的时代背景:一是“新大众文艺”的蓬勃兴起;二是人工智能写作“取代论”甚嚣尘上、引发普遍焦虑之时。“新大众文艺”由《延河》杂志在2024年率先提出。简单地说,随着互联网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飞速发展,人民大众从单纯的文艺欣赏者转变为积极的创作者,这种文化现象被称为“新大众文艺”。2026年,“新大众文艺”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,明确指出要“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”。学界将这种新型的文艺生态,视为继承中国文学“人民性”传统的创造性实践。

在“新大众文艺”的感召下,当年如长生一般热爱写作的“文学中年”率先呈上了自己的作品。是的,他们从未真正搁笔,即使因工作繁忙暂别写作,那份文学情结也不曾中断。他们以自身的创作实践为“新大众文艺”作出了生动注解:文学与写作,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。

长生说,我们在人工智能全面参与生活的背景下,来探讨“新大众文艺”更有意义和价值。人工智能何止是改变生活,它分明是颠覆世界的工具。我们为之一惊一乍和赞叹,同时也被巨大的焦虑反噬。我们擅长的、赖以为本的领域要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吗?科技的伟大潜力,总是伴随着深刻的风险。事实是,若过度地依赖AI,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文字基本功,将会被全部废掉。“我思故我在”是法国哲学家勒内·笛卡尔提出的哲学命题,这就可以理解玛格丽特·杜拉斯的真切感受——写作是发生在我身上最重要的事情。思考兴趣和思考能力,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学养深度和人格魅力。如果这些能力被AI废掉,就如同被抽走了灵魂,还有何乐趣和价值?庆幸的是,“新大众文艺”思潮兴起,各行各业的人开始书写自己的生活,写作不再是文人的专利,也是普通大众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。长生说,传统作家要深入生活采风,才能创作出真正感人的作品,如果大家都能掌握写作技能,记录所投身行业的发展变迁,将会写出多么生动鲜活的故事来。这些故事汇聚起来,如微光成炬,这不就是中国故事嘛。

长生曾兼任辽宁监狱教育改造讲师团副团长、心理矫治课题组长。《生命的礼物——长生心语》这部作品,既是他的工作成果,也是他的创作成果。一个人若有终身学习的兴趣,勤于思考和练笔,必然会“反哺”工作。写作与工作,从来不是冲突的,在相互托举中抵达更开阔的精神疆域。长生说,写作的本质是真诚生活,只要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,人工智能便无法取代我们无比钟爱的“我手写我心”的精神生活。在快节奏的生活里,寻觅片刻静谧时光,从容书写对生活的眷恋与思索,让个体书写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,在岁月长河中留下一缕波光。

早些年,因一桩公益事务,我与志愿者一同拜访某位领导。走进那栋庄严肃穆的大楼时,心中不免忐忑,给长生打电话请教如何沟通。长生说,这位领导年轻时写点东西,你们放心去谈吧。这个细节,当时令我感慨良多,多年后也常常思量。从长生的这句话里,我读出了两层深意:其一,他内心始终珍视文学的价值与写作的意义;其二,人心终究趋善向善,亲近文学、尊重文学是一种价值取向,也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与修养。

——这件小事儿一定要记在这里。

让诗歌“简单”起来

——读麦豆诗集《一个走在途中的人》

沈文军/文

说实话,认识麦豆之前,对诗歌,我是欣赏“复杂的写作”的。那是因为我们的周围,充斥着太多各种各样的图像和声音。它们让人精神紧张,脚步加快,让人逐渐远离了“简单”,所以诗歌就会出现复杂。有人总结为,一是意象繁乱,二是辞藻堆积,三是情绪泛滥,把文字和情感涂抹得很“漂亮”,但离诗却越来越远,读不懂。所以,当我拿到麦豆的诗集《一个走在途中的人》时,眼睛一亮,马上被他这种另类的简单写作所吸引。为进一步得到他的指教,我们邀请麦豆到松门讲课。到达的那天晚上,我们二人沿着宾馆前面的那条路,边走边聊,不知走了多少圈,直到深夜十二点钟,才作罢回到宾馆休息。他从李白的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”这句名诗开讲,深入地讲述了如何让诗歌简单起来。

他说,让诗歌简单起来,最好的办法就是有话直说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写诗就是说话。好好地说话,实实在在地说出人们都听得懂的话,但“有话直说”并不等于“想怎么说就怎么说”,也不等于“直接说出”,而是应该有技巧的,这技

巧,麦豆掌握得很好。如他的《送母亲至地铁入口》,“天使在高处看着她/送母亲至地铁入口,我想/地铁,通向地下的台阶/每一级上都站满了人/人群会像水流一般/将母亲送至检票口/她一定学会了刷卡进站/刷卡之后,她会适应水流猛然急促/流进一个坑的底部,那里/神奇的地铁五分钟一班,从不缺席”。又如“有时,我让他去找正在做饭的妻子/妻子让他回来找我/我再次拽我的胳膊/陪他玩一会儿。可我正忙于审读讴歌生活的诗歌/他只好一个人玩/玩了一会儿。突然/往吃饭的桌子上爬/我望了一眼他,准备呵斥/突然又想到妻子说/别理,他只是想引起你的注意”(《五岁的儿子》)。

其次,要富有诗想。诗想,是诗从思想和感悟中腾跃、升华起来的。诗想高于思想,诗想是思想的诗化,诗想是诗的根本。胡弦曾评论麦豆“他将诗歌本质等同于一种纯粹的形而上的生活的本质,而非包罗万象的那个生活。如此,并非麦豆不知道那个丰富性的可贵,而是他选择了丰富之下那个纯粹的本质。也因此,麦豆的诗歌写作具有一种哲思性,一种概念生存的形式”。麦豆的诗能给我们提供一些通往答案的路径,那就是“让感官的语言更加敏锐,一瞥之间识动荡,

于无声处听惊雷”。他的诗的思考,以对当下进行回忆的方式呈现,明快、诚恳,如更新后的浮世绘,在对深度混杂的简洁提取中有一种陌生的觉醒。读麦豆的诗,适合掩卷沉思,同一个运动的世界,他的言说,其实就是生命的律动。如《摇篮曲》,“我不是天,也不是魔鬼/我爱,但怀有淡淡恨意……//衣衫不整并非坏人/可能只是无家可归……//满地落花,并非风过/是时在催生新的果实……//骑一辆车,从单位回家/一遍遍,加深对道路的理解……//天空是故乡永恒的地址/抬头,望月,伤感是一封母亲的来信”。

麦豆的诗掌握了东方和西方当代新诗的语言技巧。说一的时候表现是二;说二的时候,表现的是三;说三的时候,其实恰恰表现了万物归一的一。“马路边的挖掘机/深陷泥坑的挖掘机/生锈是你唯一靠近我的方式/黑夜刚刚开始降临/我们从你身边经过——/从你身边经过/我想到吃人的老虎/早已灭绝的老虎/拥有长长手臂的挖掘机/或死去多年的老虎/你靠吃什么活着/是一只野兔/满天星光还是一团火焰/你是不是一台已经开始衰老的挖掘机/或者你已经死了/只剩下这铁的骨架/?我老虎一样的挖掘机/是谁狠心将你遗弃在这里/空气和清水让

你不停生锈/我老虎一样的挖掘机啊/黑夜已经开始降临/你的斑纹正连同我眼里的火苗渐渐熄灭”(《挖掘机之歌》)。

麦豆的诗简约质朴、细腻呈现了深埋在当代生活中的风物和心灵,展示出当代汉语捕捉美的充沛效能。诗人在其开辟的返乡小径上,激活万物,追问人性,凭借通感与人世达成的各种谅解感人至深。

麦豆,是当代80后青年诗人,现居南京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《扬子江诗刊》编辑。曾获江苏省第六届紫金山文学奖、中国诗歌网2021年度十佳诗集、2011年第二届汉江“安康诗歌奖”等荣誉。曾参加诗刊社第30届青春诗会、鲁迅文学院第31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会等。其诗集《一个走在途中的人》由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,全书共分三辑:《长途车为什么开得慢》《我们为什么给灵魂建造栅栏》《那些不渡江的事物》。

读麦豆的诗集《一个走在途中的人》,我深深地体会到写简单诗歌的好处,以及如何让诗歌写作简单起来的办法。所以说,简单,闪耀着迷人的光芒。